

日俄争议领土交涉中的美国因素*

陈梦莉 白如纯

【内容提要】 美国因素对“北方领土”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冷战架构下追随美国对抗苏联，成为日本外交的必然选择。冷战结束后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日本寻求战略自主性。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解决两国间的领土问题，成为日本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日美同盟一直是日俄领土交涉的“拦路虎”，日本对俄领土外交在俄美之间面临两难困境。同时乌克兰危机和“特朗普冲击”也使俄美关系和日美同盟陷入困境，增加了日俄领土交涉的不确定性。未来日俄领土交涉将会继续囿于日美同盟和俄美关系框架内，短期内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关键词】 “北方领土”问题 日俄关系 俄美关系 日美同盟

【作者简介】 陈梦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博士后；白如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北方领土”问题是日俄关系的症结所在。关于“北方领土”问题，国内外专家学者已经对其进行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研究^①。但是，从美国因素的视角系统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日本领土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6CSS018）的阶段性成果。

① 南开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研究室所编《日本北方领土问题论文及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通过原始资料详细分析了“北方领土”问题的来龙去脉；李凡所著《日本“北方领土”问题政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是目前国内专门围绕日本“北方领土”问题进行研究的最详细最新且为数稀少的著作。Kimie Hara, Geoffrey Jukes 所著《“北方领土”问题、亚太地区冲突和阿兰群岛的经验》（*Northern Territories, Asia - Pacific Regional Conflicts and the Aland Experience*, Routledge, 2009），根据各地政府官员和学者汇编了以阿兰群岛为决议模式处理日俄之间的领土争端的著作。木村汎、袴田茂树、名越健郎等研究“北方四岛”问题的激进派学者从日俄领土交涉史、国际法角度等要求对“北方四岛”的主权，参见木村汎：『北方領土問題を考える』，北海道新聞社，1981年版；高野雄一：『国際法からみた北方領土』，岩波書店，1986年版；明石康、吹浦忠正、袴田茂樹：『日本の領土問題（虎ノ門 DOJOブックス）』，自由國民社，2002年版；名越健郎：『北方領土の謎』，海竜社，2016年版。和田春樹、岩下明裕等温和派学者从日俄双边关系角度主张基于现实利益尽快解决“北方四岛”问题，参见和田春樹：『北方領土問題を考える』，岩波書店，1990年版；和田春樹：『領土問題をどう解決するか』，平凡社，2012年版；岩下明裕：『北方領土問題—4でも0でも、2でもなく』，中央公論新社，2005年版；岩下明裕：『日本の「国境問題」（現場から考える）』，藤原書店，2012年版。

分析日俄争议领土交涉的成果很少，大多是就某个阶段的领土交涉过程进行零散的阐释，系统性深入分析欠缺^①。

美国因素不仅导致“北方领土”问题形成，也是日俄领土交涉过程中的阻碍，并影响日俄关系的未来走向^②。美国主导的“旧金山体制”是“北方领土”问题形成的直接原因。美苏冷战以及《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使日苏之间矛盾不断升级，成为日后解决领土问题的重大障碍。尽管矛盾尖锐、障碍重重，但也曾出现过至少三次解决领土问题的时机。预计最新发生的乌克兰危机及后续发酵，也将对日俄领土交涉产生影响。

一 “北方领土”问题形成中的美国因素

“北方领土”争夺战从17世纪末延续至今，历经三百余年，“北方领土”曾几次易手。伴随着俄日国力的此消彼长，双方国内政策调整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该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从过程来看，日俄领土争端不仅取决于两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也深受国际格局和域外大国的影响；从方式来看，诉诸战争或外交谈判，最后订立条约则是两国划分边界、解决领土争端的主要手段。

19世纪中叶以前，日俄明确千岛群岛的归属和得抚岛的中立地位，双边关系整体稳定。自19世纪中叶，沙俄实行政治和军事扩张。时值日本幕府统治晚期和明治维新初期，国力相对弱小。在“俄进日退”的态势下，通过《日俄友好条约》和《库页岛·千岛群岛互换条约》，日本向沙俄拱让库页岛换取整个千岛群岛^③。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的结果，使日本国力大增，双方对远东地区的争夺整体呈现“日进俄退”的态势。通过《朴茨茅次条约》，沙俄将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地区割让给日本^④。

根据二战末期美苏英三国首脑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纳

^① “北方领土”问题分为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从广义概念上看，“北方领土”问题是指日本曾占领并统治的库页岛南部和“北方领土”的归属问题，因此不仅包括“北方领土”问题，还包括库页岛南部的归属问题；从狭义概念上看，“北方领土”问题指的是包括齿舞群岛、色丹岛、国后岛和择捉岛在内的“北方领土”归属问题，俄称“南千岛群岛”，这也是本文接下来探讨的内容。

^② Панов А. Н., Казаков О. И., Кистанов В. О., Кузьминков В. В., Павлятенко В. В., Стрельцов Д. В., Чугров С. В.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российско - япо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х развития. М.: Спецкнига, 2012. С. 7.

^③ Син Маруо, Японо - российск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стория, настоящее, будущее//Вестник ДВО РАН. № 4. 2005.

^④ 木村汎：『日露国境交渉史—領土問題にいかに関与するか』、中央公論社、1993年、第98頁。

入苏联版图^①。可以说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最终惨败、《雅尔塔协定》和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体制”是战后日苏“北方领土”问题形成的最直接根源^②。

（一）美国否认对苏联领土要求的承诺

二战期间，美英苏三大首脑商讨开辟第二战场，苏联把重新收回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并签订《雅尔塔协定》。其中关于日苏领土问题规定：日本于 1904 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须予恢复，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③。这也成为战后苏联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立场的主要依据。随后，苏联发动“八月风暴”军事行动，进攻库页岛南部，并实施军事占领。1946 年 2 月，苏联宣布将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纳入苏联版图。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极格局对峙，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利益需要，美国把“北方领土”问题作为遏制日苏关系正常化和双边关系改善的楔子。虽然二战期间，美英苏三国签署《雅尔塔协议》，美国承诺将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交予苏联，但二战后美国把日苏之间的争议领土作为推行其远东战略的工具，意在使《雅尔塔条约》有关内容空洞化^④。美国主张在对日媾和条约之前，不能明确这些岛屿的最终归属，随后逐渐确定了单独对日媾和以及单独占领日本的目标，意在将其纳入资本主义阵营。

1947 年 3 月，美国开始推动对日媾和工作，随后否认了《雅尔塔协定》有关千岛群岛归属苏联的内容。1951 年 6 月，美英两国制定了《美英共同条约》的修正版，对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不说明其归属，也未规定千岛群岛的范围，有意使领土问题复杂化^⑤。1951 年 9 月 4 日，美英日等国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媾和会议，会议内容完全按照《美英共同条约草案》进行，对日苏之间的领土问题未作任何修改，也未规定千岛群岛的地理范围，但最终被大会通过。9 月 5 日，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强烈要求对日苏领土问题“关于第 2 条款（C）项应作修改，

①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Япония: попытки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Читая книгу А. А. Кошкина "Россия и Япония: узлы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No1. 2013.

② 李凡：《日本“北方领土”问题政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 页。

③ [日] 吉田嗣延：《日本北方领土》，吉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室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22 页。

④ 岡田和裕：『ロシアから見た北方領土—日本から見れば不法でも、ロシアにとっては合法』、光人社 NF 文庫、2012 年、第 115 頁。

⑤ 細谷千博：『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への道』、中央公論社、1984 年、第 274 頁。

要求日本政府承认苏联对库页岛南部的主权”，但被美国主导的对日媾和大会拒绝。1951年9月8日，对日媾和大会举行和约签字仪式，苏联代表因领土问题拒绝在《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上签字^①。

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不承认把《雅尔塔协定》作为日俄两国划分领土的依据，将“北方领土”问题的归属模糊化，既未明确千岛群岛的范围，也未确定千岛群岛的主权归属，为日苏“北方领土”争端埋下伏笔^②。因为若美国承认《雅尔塔协定》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有效性，就等于承认苏联对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主权，这样就给了苏联靠近日本本土的机会，会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和日本的安全造成威胁。在“旧金山体制”下，美国把日本作为其在亚太地区反苏反共的重要堡垒之一，绝对不允许日苏在“北方领土”问题上达成和解^③。可以说，以美国为主导的“旧金山体制”是“北方领土”问题形成的直接原因。

（二）美国因素阻碍日苏邦交正常化

由于苏联拒绝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上签字，日苏在战后并未建立外交关系。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相互战略利益需要，日苏双方都迫切希望恢复邦交关系，也为双方解决领土问题提供了新契机。吉田茂“对美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引起国内民众的不满。“造船疑狱”和“福龙号”事件使吉田政权遭到越来越多民众的抗议和反对，国内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吉田力量。而此时，苏联为与美国争夺对日本的控制和影响力，促使日本脱离美国，开始对日本采取缓和态度。赫鲁晓夫上台后，积极促进与日本的接触，后通过“多莫尼斯”信件逐渐打消日本的疑虑，改善了双边关系。在此背景下，日苏双方开始积极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

在1955年的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两国通过伦敦大使级谈判、莫斯科外长级谈判以及莫斯科首脑级等谈判力图在“北方领土”问题和恢复邦交正常化之间达成协议。由于美苏冷战，美国和日本国内亲美派抛出“北方领土”问题，竭力遏制日苏关系改善。在日本国内政界，主张调整日苏关系的“鸠山派”与

① 細谷千博：『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への道』、中央公論社、1984年、第275頁。

② 矢野義昭：『日本の領土があふない』、ぎょうせい、2013年、第154頁。

③ Казаков Олег Игоревич. К 60 - летию Совместной декларации СССР И Японии 1956 года// Япон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No 1. 2017.

坚持追随美国的“吉田派”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开始形成争论^①，以吉田茂和田田勇人等亲美派为代表的“吉田派”，始终反对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和改善日苏关系，担心修改旧金山体制会给日美关系带来损害^②。

美国则担心日苏在“北方领土”问题上达成协议，势必会引起日本对琉球群岛的要求，这些可能的趋势都不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要求。因此，美国提出支持日本政府关于色丹岛和齿舞群岛不包括千岛群岛在内的主张，设法阻止日苏关系正常化。美国威胁日本，如果接受苏联返还二岛领土方案的话，美国将不会把冲绳归还给日本^③。美国不断发出警告，反对日本向苏联让步，因此日本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的选择余地很小^④。日本政府一直在返还两岛还是四岛之间犹豫不决，最终迫于国内势力和美国压力选择搁置“北方领土”。1956 年 10 月，日苏两国签订《日苏联合宣言》，声明规定“两国复交后继续进行缔约谈判，苏方同意在缔约后把齿舞、色丹交予日本”^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苏未达成领土协议，《日苏联合宣言》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双边关系。

从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看，“北方领土”问题看上去只是关乎日苏两个国家，实际上美国对日苏领土交涉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领土问题已成为美国操纵日本的工具。日本在外交事务上以对美协调为准则，当与对美协调的准则发生矛盾时，日本一般都会顺从美国，按照美国意图行事^⑥。因此，在日苏邦交正常谈判中，日本也必须看美国脸色行事，领土问题最终被搁置处理成为遗留问题。随后不久，随着日美两国签订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苏关系骤然紧张，苏联感到面临更大的军事威胁，宣布“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完毕”，表示不与日本政府继续就“北方领土”问题进行交涉。

① 吉田派坚持“对美一边倒政策”“重经济、轻军备”，对日苏邦交正常化持消极态度；鸠山派基于“传统国家观”，主张恢复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积极推进日苏邦交正常化。社会党和共产党等革新势力反对日本安保条约，主张积极调整对苏政策，尽快恢复日苏邦交正常化。革新势力和鸠山派很快结成反吉田派，积极主张恢复日苏邦交正常化。

② 陈梦莉、张强：《日本国内关于“北方领土”问题的争论、原因及影响》，载《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5 期。

③ 矢野義昭：『日本の領土があふない』、ぎょうせい、2013 年、第 156 頁。

④ 李凡：《日本“北方领土”问题政策研究》，第 141 页。

⑤ Казаков Олег Игоревич. К 60 - летию Совместной декларации СССР И Японии 1956 года// Япон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⑥ 郭定平：《日本政治与外交转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7 页。

二 日俄领土争端升级中的美国因素

尽管日苏两国恢复了正常化关系，但不久之后美日新安全保障条约签订，使日苏领土争端升级，苏联有针对性增加了返还领土的新条件，即只有美军撤出冲绳群岛才能签订和平条约，两国领土交涉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纵观日俄领土交涉史，在美苏关系缓和背景下也曾出现过解决双方领土问题的时机，但因各种原因两国错失了解决领土问题的好时机，最终使领土问题陷入僵局。

（一）新《日美安保条约》为领土返还添堵

面对日本国内反美浪潮的不断高涨，岸信介上台后，把密切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重心，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成为其重要的政治使命。随着1960年1月19日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署，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后双边关系短暂的稳定局面遭遇挫折。

新安保条约的修订使苏联感受到日美同盟带来巨大的军事威胁，苏联国内主张对日强硬的声音占据上风。1960年1月27日，苏联向日本提交备忘录，表示“新日美安保条约否定了日本独立，驻日美军使苏联原本约定将色丹岛和齿舞群岛让渡给日本变为不可能。该条约打乱了远东地区和平，同时色丹岛和齿舞群岛很可能成为监视中国和苏联的军事基地。因此，只有美国军队从日本撤离后，日苏才能签订和平条约”^①。同年2月24日，苏联提交了第二份对日备忘录，否认了日苏之间存在领土问题，宣布“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完毕”。1961年11月15日，池田首相致信赫鲁晓夫，针对“北方领土”问题明确指出，“在《旧金山和约》中日本所放弃的千岛群岛不包括国后岛和择捉岛，这两个岛屿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对此并未放弃过任何权利”^②。日苏两国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各执己见，领土问题再次陷入僵局。

新《日美安全保障》签订后，驻日美军成为苏联让渡色丹岛和齿舞群岛考虑的重要因素。苏联的第一份对日备忘录，实际上成为苏联（俄罗斯）政府从过去到现在制定领土政策的重要依据。虽然国际环境和国内政局发生了变化，但

^① 須田諭一：『北方領土問題、その原点はなにか？』、メトロポリタンプレス、2015年、第98頁。

^② 〔日〕吉田嗣延：《日本北方領土》，第58頁。

仍然是目前俄罗斯处理对日领土问题最重要的政策依据^①。苏联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增加了返还色丹岛和齿舞群岛的新条件，主张只有在日本废弃《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后，才能将领土让渡日本。因此，新《日美安保条约》成为日本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重要障碍。新《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后，日本在“轻武装、重经济、日美安保”为指针的“吉田路线”下，发展本国经济被确定为最优先课题。在日美同盟框架下，与苏联对峙并坚持强硬的领土政策，“北方领土”问题基本上需遵从美国意愿。冷战后，日美军事同盟经过“再定义”持续发展巩固，这使日俄很难建立安全互信。虽然日本曾尝试突破传统的“北方领土”政策，但由于囿于日美同盟的制约，领土问题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二）日俄领土交涉的转机

纵观日俄领土交涉史，尽管外部和内部因素令领土争端不断升级，但也曾出现过至少三次解决两国争议领土的时机。

第一次转机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美苏缓和、美国归还冲绳时期。新《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加强在争议领土上的军事防卫力量，日苏两国围绕是否存在领土问题争论不休。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上台，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战略收缩政策，使日本对抗苏联的实力减弱。同时，为强化日美关系，美国政府决定返还冲绳群岛，使苏联失去了返还“北方领土”问题的借口，从而陷入被动局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促使苏联积极改善对日关系。在“北方领土”问题上，苏联政府改变了一直坚持的“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完毕”立场，退回到 1956 年《日苏联合宣言》的立场，并暗示可以返还色丹岛和齿舞群岛^②。此外，美苏关系的缓和也使日苏关系有了改善的可能，日本出现了自主调整对苏外交政策的机会。日本希望利用中日关系正常化作为压迫苏联在“北方领土”问题让步的工具，遂调整对苏政策。1973 年 10 月，田中首相应邀访问苏联，日苏双方签署并发表《日苏联合宣言》，以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未解决的各种问题”的表述方式，间接将“北方领土”问题作为日俄缔结和平条约必须涉及的重要问题。日苏确认将“北方领土”问题列入战后未解决的问题，为两国解决领土问题创造了时机。但是，石油危机的爆发使

^① 須田諭一：『北方領土問題、その原点はなにか?』、メトロポリタンプレス、2015 年、第 98 頁。

^② 五百旗頭真、下斗米伸夫：『日ロ関係史：パラレル・ヒストリーの挑戦』、東京大学出版会、2015 年、第 465 頁。

田中首相无暇顾及“北方领土”问题，日本又继续坚持“政经不可分”的强硬立场。随着三木武夫上台，日苏领土交涉又重陷困境。

第二次转机出现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到冷战后初期美苏短暂的“蜜月期”时期。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对外政策的“新思维”，缓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为日苏关系的发展带来新机遇。日苏两国不断举行首脑和外长级会谈，加强双边经济和文化联系，为解决“北方领土”问题营造了良好氛围。随后戈尔巴乔夫访日，日苏发表联合声明，苏联正式承认两国之间存在领土问题，争议领土的范围不仅包括色丹岛和齿舞群岛，而且还包括国后岛和择捉岛^①；双方在1956年《日苏联合宣言》达成一致的基础上，试图寻找解决领土问题的新方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取亲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俄美进入短暂的“蜜月期”。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态度的转变为日俄解决领土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西方国家要求日本放弃长期坚持的“政经不可分”政策，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这段时期已具备了解决领土问题的有利条件。但是，日本政府试图利用对俄经济援助，将“北方领土”问题国际化，借用西方七国的力量迫使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让步。但是，日本政府高估了俄罗斯对经济援助和合作的渴望程度。虽然俄罗斯确实需要日本的经济援助，但绝不会以轻易牺牲领土作为换取日本经济援助的条件。

第三次转机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普京执政初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日俄三角关系重新呈现一种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竞争的态势。美国一方面支持俄罗斯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通过北约东扩缩小俄罗斯外交空间。与此同时，俄罗斯经济持续滑坡，“华盛顿共识”也并未取得成效，这使得俄民众对西方国家的反感情绪与日俱增。日本尽管泡沫经济崩溃，但作为经济大国的实力依旧。亚太地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迅速成长^②。俄罗斯面对世界多极化形势的变化和自身实力及影响力的下降，遂改变对外政策，开展“欧亚外交”，把发展与东亚国家的关系作为“新侧重点”^③。日本政府也不再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安全威胁，为强化自身安全和增加国际地位，日本积极寻求与俄罗斯合作。从1996年起，桥本内阁把日俄关系作为外交重点，积极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在领土问

① 須田諭一：『北方領土問題、その原点はなにか?』、メトロポリタンプレス、2015年、第120頁。

② 亚太地区经济不断快速增长，其实际增长率1990年为6.4%，1991年为6.7%，1992年为7.4%，1993年为7.5%，1994年为7.8%，1995年为7.3%。

③ 西村陽「『ユーラシア』外交の舞台裏」、世界』1998年1月。

题上用“多层次接触”方针代替原先“政经不可分”原则，呼吁两国加强政治对话和发展经济合作。日俄两国通过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川奈举行的两次“不系领带”谈判，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双方同意在 1993 年《东京宣言》的基础上解决领土问题，力争在 2000 年前缔结和平条约^①。

2000 年普京执政后，力求利用自身拥有的欧亚大国地缘战略地位，协调东西方国家关系^②。普京采取灵活实用的外交政策，把与日本的合作看做加强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因素。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普京继承了叶利钦的领土路线，承诺对日政策的一致性，与日本建立创造性伙伴关系。在伊尔库茨克首脑会谈上，俄罗斯承认了 1956 年《日苏联合宣言》的有效性，讨论了色丹岛和齿舞群岛的返还问题，根据 1993 年《东京宣言》再继续讨论剩余两岛的归属问题^③。伊尔库茨克会谈成为日俄领土交涉的新起点，为日俄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但“铃木事件”^④的爆发使日俄双方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倒退，激起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日本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领土政策，日俄关系再度陷入紧张局面。

三 乌克兰危机后的日俄领土交涉新动向

2012 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在日俄双边关系上向日本发出积极信号，重燃日本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希望。安倍第二次执政后，积极开展对俄外交，力图摆脱战后体制。但是，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破坏了日俄关系改善的节奏。乌克兰危机后至今，日俄领土交涉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随着乌克兰危机的不断升级，在美国压力下，日本不断对俄罗斯追加制裁，阻碍了日俄领土交涉进程。第二个阶段是，为修复和改善日俄关系，安倍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日俄领土争端的新方式和新理念，谋求突破领土困境，日俄关系有所转圜。

① 和田春樹『北方領土問題歴史と未来』、朝日選書、1993 年、第 368 頁。

② Nezavisimaya Gazeta, Moskovskie Novosti, Feb. 29, Mar. 6, 2000.

③ Казаков О. И. О "хикивакэ" в российско - 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Япон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6. No1.

④ 2002 年初，日本媒体曝光了前自民党立法委员铃木宗男的一系列丑闻，铃木被指干涉援俄工程“日俄友好之家”招标，接受北海道岛田建设公司贿赂，还涉嫌伪造报告私藏政治捐款和发表过“归还与否无所谓”等言论。该丑闻对小泉内阁在“北方领土”问题的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日俄双方中断了高层往来，双方关系陷入低谷。

（一）乌克兰危机阻碍日俄领土交涉进程

第二届安倍内阁成立后，在对俄关系上，日本主动发起外交攻势，领土政策更趋灵活。安倍以“战略外交”和“重视国家利益外交”为基础把改善民主党时期跌入冰点的日俄关系作为战略重点，重建“受损的日本外交”，并将日俄关系界定为“最具改善可能性的双边关系之一”^①。安倍力求与俄罗斯解决领土问题，尽快签订和平条约^②，表示“解决日俄领土争端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③。普京也表示愿意推进缔结日俄和平条约谈判，建立促进双方经济和安全等交流合作机制，提出以“打平手”的方式解决“北方领土”问题^④。

日俄两国通过双方领导人建立起的个人关系密切了政治联系。2013年4月，安倍访问俄罗斯，日俄开启双边关系“解冻”的历程^⑤。日俄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应该在此前已签署的文件基础上制定彼此都能接受的领土解决方案之后，再签订和平条约^⑥。双方一致同意建立外交、防务部长级磋商机制，强调“在互惠互信的原则下发展双边关系”^⑦。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俄首脑频繁会晤，重启“北方领土”问题和缔结和平条约谈判，双边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日本对俄政策发生转变。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⑧。美国表现出对乌克兰前所未有的重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力度加强，成为危机不断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⑨，并迫使日本加入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作为西方集团成员的日本处于一种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必须跟随美国与欧盟参与制裁；另一方面，还必须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关系。日本最终采取了追随美国的对俄制裁政策，宣布实施包括冻结日俄投

① 『第一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710118siseuhousin.html

② Ratner E. , Rosenberg E. “Pointless Punishment. How the Sanctions on Russia Will Hurt Asia”, *Foreign Affairs*, 18. 09. 2014.

③ 『安倍首相「強い意思で交渉」北方領土解決に向け意欲』，<http://www.47news.jp/CN/201708/CN2017082401001273.html>

④ Казаков О. И. О " хикивакэ" в российско - 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Япон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No 1. 2016 .

⑤ V. V. Nelidov, “Russian - Japanese bilateral relations: limits of rapprochement”, *East Asia: Facts and Analytics*, Feb. 2019.

⑥ 矢野義昭：『日本の領土があぶない』、ぎょうせい、2013年、第159頁。

⑦ 桜美林大学北東アジア総合研究所日ロ関係研究会編：『東京とモスクワ—改善のチャンスは近いのか—』、桜美林大学北東アジア総合研究所、2013、第194頁。

⑧ Jean - Christophe romer. The Weimar Triangle and The Ukrainian Crisis//Вестник РУДН, се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No 4. 2014.

⑨ 梁强：《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战略目标——基于美乌关系的分析（1992~2014）》，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2期。

资和宇航合作在内的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

对于日本对俄的制裁行为，俄罗斯表示不满并实施反制裁措施，同时宣布推迟日俄两国副外长原定就“北方领土”问题的磋商。此外，俄罗斯在“北方领土”举行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表明俄罗斯军队捍卫“北方领土”的决心，不会在日俄争议岛屿作任何妥协。日本政府对此提出“严正抗议”，日俄关系处于高度紧张。日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的不断升级出现重大倒退。

日本在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同时，为尽快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也努力稳定与俄关系，希望趁俄罗斯陷入政治和经济困境之机在领土问题上有所突破。从整体上看，日本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措施相较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制裁力度要小。日本试图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开展平衡外交，既想使美国满意，又不想彻底惹怒俄罗斯，所以不断暗中寻求俄方的“理解”，以寻求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方法。但俄方对此表示，日本改善两国关系的意图是虚伪的，批评日本对俄追加制裁，宣布推迟普京访日计划。

乌克兰危机阻碍了日俄领土交涉的进程。在西方国家对俄集体制裁和俄美关系低迷的情况下，美国不愿看到日俄关系有实质性突破，日本的对俄政策要服务于美国的亚太战略。日本必须保证在日美同盟和俄美框架下调整对外政策，因此改善日俄双边关系是有限度的。虽然日本只是象征性的制裁，但不可能取消对俄制裁。日本一方面对俄实施制裁，另一方面对俄提出经济合作计划，对俄立场本身就存在矛盾。最重要的是，日本难以在追随美国和改善日俄关系之间找到平衡，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和缺乏自主性外交，成为与俄领土交涉的最大障碍。

（二）日俄领土交涉谋求突破与困境

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为摆脱外交孤立困境，把日本作为瓦解西方制裁的突破口，积极发展对日关系，以获得投资和贷款。2016 年安倍两度访俄，四见普京，对俄展开积极的外交政策。

首先，安倍提出解决领土问题的“新思维”。2016 年 12 月，俄总统普京访日，在日俄首脑会谈后安倍首次公开提出“以经济合作撬动领土争端”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新思维”^①。“新思维”改变了日本政府一直坚持的将发展经济和领土问题相挂钩的“扩大均衡”模式，双方可以在争议岛屿开展共同经济活动，优先发展双边经济，为解决领土问题创造条件。安倍首相提出两国在

^① V. V. Nelidov, “Russian – Japanese bilateral relations: limits of rapprochement”.

“特别交涉制度”框架下共同进行经济活动，通过开展官民经济合作，为解决“北方领土”问题营造良好氛围^①。但是，俄罗斯表示绝不会用“北方领土”做交易，强调必须基于俄罗斯法律框架双方才能进行共同经济活动^②。日俄两国在领土立场主张、缔结和平条约和遵循的法律制度等方面仍存在分歧，但“新思维”的确使日俄关系有所接近，领土政策更趋灵活。

其次，建立日俄磋商机制。日俄两国通过首脑私人关系的推动，双方领导人建立起个人关系，并保持密切政治联系。安倍首相在确信彼此能够长期执政后，认为普京政治强人下的稳定政权是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机会。日俄双方领导人也都有意在他们任期内改善双边关系，这使双边关系迅速升温。安倍第二次执政至2019年底已五度访俄，与普京会面达25次。日本试图与俄保持密切的政治联系，以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同时，日俄建立和启动外长防长磋商（2+2）机制，深化双边安全合作。此外，2016年9月，日本政府新设对俄经济合作大臣，展现对俄经济合作诚意。

另外，安倍提出“战后外交总决算”新理念，重点内容是日俄北方领土问题。2018年9月，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提出“战后外交总决算”，决心开展和调整与东北亚邻国关系。同年10月，安倍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表达了开展“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决心，表示要将与俄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开创“日俄新时代”。2018年11月，日俄领导人在新加坡会晤，达成了依据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加快缔结和平条约的意愿。为继续推进日俄关系，日本2019年《外交蓝皮书》不再沿袭“北方领土归属日本”的说法^③，双边关系出现转圜。

日本积极主动的外交攻势迎合了俄罗斯希望缓解因乌克兰危机与美欧对抗的压力。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俄美关系对抗僵局下，日俄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短时间内将难以取得进展。俄罗斯一再强调开展经济合作与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无关，并未同意与日本进行领土谈判。随着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俄美军事博弈愈发激烈，双边关系结构性矛盾愈加难以调和，美国对俄施压已成“常态化”。在俄美关系越来越往对立方向发展的背景下，从2016年下半年起两件“罗

① 「タス通信」（ロシア）による安倍総理大臣インタビュー、2016年12月18日、http://www.mofa.go.jp/mofaj/p_pd/ip/page4_002607.html

② 「プーチン氏、共同経済活動に意欲」、『朝日新聞』2017年6月16日。

③ 令和元年6月14日令和元年版外交青書（外交青書2019）の刊行〔OL〕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fp/pp/page23_002506.html

生门”事件又为双边关系雪上加霜。2017 年 8 月，美国又通过了新的对俄制裁法案，进一步固化了美国反俄的政策基调^①。如果俄美关系持续恶化，日俄关系将在短期内也很难转圜。

四 日俄领土交涉的前景展望

安倍再次上台执政后将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和进一步改善日俄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重点，2018 年日俄首脑达成以 1956 年《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速和平条约缔结谈判的意愿，貌似找到了提升两国关系的“突破口”，但两国在如何对待二战结果及领土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双方分歧难以弥合。从长期看，日俄两国存在战略互惠，两国关系的接近是历史的必然。但在短期内，日俄领土交涉将会继续受制于俄美关系和日美同盟框架，不会取得实质性进展。

首先，从乌克兰危机前后日俄关系的变化可以看出，两国领土争端的交涉难以摆脱俄美关系大框架的影响，日本对俄外交在俄美之间面临两难困境，难以找到平衡。日俄关系很大程度上从属于俄美关系，当俄美关系紧张时，俄罗斯为扩大外交空间倾向于改善日俄关系，但日本由于受美国因素制约，在对俄政策上也不会有大的调整；当俄美关系缓和时，日本在俄罗斯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下降，俄罗斯往往不急于发展双边关系，日俄双边关系改善缓慢。亚太地区存在中俄美日四个大国、六对双边关系及四组三角关系^②，日俄双边关系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格局中，会受到其他双边关系和三角关系的制约。日俄关系的发展受制于美国因素，日本只能在不影响美国对俄罗斯外交方针范围内发展日俄关系^③。俄美关系存在战略性矛盾，美国不会允许日本对俄政策有实质性改善。

未来日俄领土交涉还将会受制于日美同盟。冷战后，日美同盟非但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解散，反而在冷战后不断调整和强化。日本作为美国第一岛链最重要的军事盟友，美国已经把日本打造成针对俄罗斯的岛链封锁阵地和海上反导以及美军前沿预警阵地，这引起俄方的忧虑并采取一系列针锋相对措施。虽然日本在

^① 姜毅：《解析美国对俄制裁新法案》，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② 中日、中美、中俄、俄美、日俄和日美等六对双边关系及中俄日、中俄美、中日美、日俄美等四组三角关系。

^③ Волков С. В. Япония во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и и США // 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 2015.

日美同盟框架下也试图追求战略自主性，积极改善与俄关系。但是，由于受日美同盟的限制，日本只能作有限调整，因为美国不可能让日本脱离自身战略性框架使日俄关系有实质性改善。日美同盟的存在不利于日俄安全互信的构建，只要存在日美同盟，俄罗斯就很难真正相信日本，绝不会向其返还“北方领土”。对日本而言，日美同盟是战后日本外交基轴，日本非但不可能摆脱日美同盟，还担心被美国抛弃将会继续强化同盟关系。因此，日俄在“北方领土”问题和日美同盟上已形成死结，日本必须在日美同盟和“北方领土”中作选择。

从长期看，日俄关系趋向战略接近，未来领土问题可能会出现转圜。首先，日俄存在战略互惠，日本需要借重俄罗斯的影响力成为“政治大国”，与俄尽快解决领土问题才能实现“战后外交总决算”，摆脱战后体制。俄罗斯亦有求日本，需要日本的经济合作和援助，以提升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同时，日俄两国经济存在很大的互补性，这成为日俄关系和改善的动力。日本和俄远东地区合作前景广阔。日俄双边经济合作的发展能够为解决领土问题创造良好环境。

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未来不排除美国借力打力，支持日俄关系走近。当前，美国虽然忌惮日俄关系走近，干扰对俄制裁大局，但基于离间中俄的现实考量，日俄关系改善与美国战略利益相契合^①，利于维持欧亚力量平衡。日俄关系是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缩影，随着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美国或可利用日本，使其成为在中俄之间打入的楔子。

成为政治大国是日本未来战略的核心，今天的日本对美并非完全亦步亦趋，会随国际形势和自身实力变化而变化。在对俄政策上，签订和平条约和解决领土问题涉及日本的根本利益，今后双边关系发展可能更趋灵活。日本会在“追随美国”和“维护战略自主性”间维系某种平衡，基于国家利益追求战略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与俄领土交涉中的“美国色彩”。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陆忠伟：《安倍对俄外交甩出大牌》，载《文汇报》2016年9月6日。